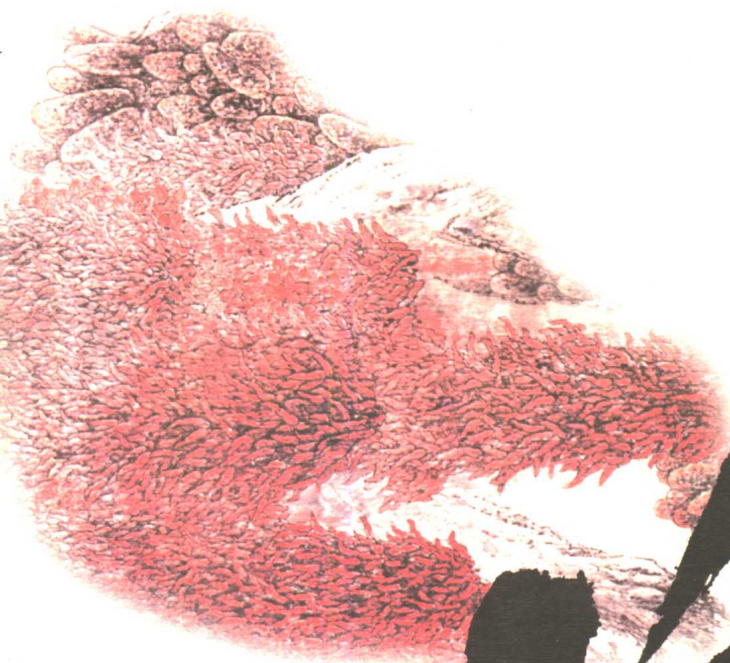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浩岭著 袖珍系列

血



长江文艺出版社

血

浩

岭

著

炕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 炕/浩 岭著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袖珍系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72-9

I.血…

II.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199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李新华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2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2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 7-5354-2072-9/I·1578 定价:12.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浩岭，男，甘肃两当县人。生于1955年12月25日。

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多篇，计约四百万字，获省级以上文学奖三十余项，作品被多家图书馆和藏书中心收藏，并有一部分译介海外。

现为浙江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曾在国内多所大学开设文学讲座。

出版说明

90年代初,我社曾经在严肃文学走入低谷时,推出了“跨世纪文丛”。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6辑共6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图书陆续出版后,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跨世纪文丛”汇集的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在长篇小说的出版上,我们还缺少一个能为读者识别的品牌。今年夏天,我们在讨论出版一套袖珍长篇小说时,想到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这个曾一度代指对湖北人褒贬不一的小精灵作为我们这套书的标识。

关于“九头鸟”,《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曾写道:“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正字通》云九头鸟:“状如鸛鹑,大者广翼丈许,昼盲夜瞭,见火光辄堕。”宋梅尧臣《古风》诗:“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自从狗啖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迩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鸛鹑。”但是后来,人们把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到了一起。提起湖北籍的人氏,人们会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其意,是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精明。一般的鸟儿只有一个头,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自然不是对手。湖北是九省通衢,汉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资的主要集散地,在人们的印象中,湖北人会经商,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无商不奸,与湖北人打交道,小心吃了亏。所以,九头鸟之于湖北人,实际上是具

有一定贬意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人们由过去的揶揄与嘲讽变成了某种褒意。

当然,我们将拟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归之于“**九头鸟**”系列,并不是完全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地是在湖北,而是我们认为“**九头鸟**”这个形象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南阳汉画石刻,从那飘逸、夸张的表现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头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需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复合型人才吗?而“广翼丈许”的九头鸟却正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如果拿计划经济时期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的行为,就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

不过,我们一开始只准备推出一套比较短小的长篇小说,如12万字左右的篇幅的作品,来冠之以“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后来,我们觉得如果仅仅限于篇幅,那么就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不能归纳其中。经过商量,并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我们准备像“跨世纪文丛”一样,有计划地逐年推出一批长篇小说。总题用“**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其中包括那些12万字左右的“小”长篇小说。当然,凡是入选这个文库的,不能仅看篇幅长短,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气,我们既重视题材的多样性,也注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既重视作品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否则,我们这套文库有可能成为流星只能展示短暂的亮丽。

我们十分明白,出版者仅仅有一个计划还是不行,这套小说最终能否为读者接受,能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还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像我社的“跨世纪文丛”一样,在文学事业的长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雷 达

当我们决定以“九头鸟”来命名这套“袖珍长篇小说系列”时,我们的心情是愉悦而自信的。这不仅因为丛书的出版地就在湖北,人们过去曾有过“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一说,以此冠之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更是因为“九头鸟”这个神话传说中的小精灵,曾经有过深厚的文化沉积,曾经不乏意蕴复杂的揶揄与嘲讽。而且,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这个小精灵又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褒扬。试想,一只鸟儿有如此之多的感知反应中枢,负载着如此之多的内涵和外延,那该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近年来,由于“8”暗合了粤语中的“发”,世人便趋之若鹜,纷纷讨个吉利,以至造成了全民崇“8”的荒诞剧。孰不知,“9”这个数才是真正有来历的。“9”在传统文化中被称为极阳之数,“九者究也”,没有比它更大的了。于是,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皇帝是九五之尊,连京城的城市楼子也非要修够九个。于是,庄周在他的《逍遥游》中大声欢呼北冥的大鹏“扶摇直上者九万里”。我说这些,决不意味着准备针对崇“8”现象再制造个崇“9”闹剧,只是想说,“9”包含着向顶峰冲刺,向极限挑战,向审美的高峰勇敢攀登的一种向上的追求。当九头鸟们翩然而起时,那情景不也十分新异和壮观吗!

当然,过多地在“9”或“8”上做文章是没有多大意思的,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放飞的九头鸟不是别的,而是一批长篇小说,

而且是一批袖珍长篇小说。我们要特别强调“袖珍”两个字。事实上,在读者中早就有一种对小长篇的渴求,人们总是在私下里说,“十二三万字的长篇最好读了”,“大部头的长篇太多了,实在没时间读”,但这一重要的阅读期待信息好像始终没有得到正视。目前的长篇小说创作,追求史诗化、多卷本化、编年史化的倾向仍然是一种时尚,小长篇的创作仍然不甚发达,读者对小长篇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正是有感受于此,我们才认真推出这套“袖珍长篇小说系列”,并准备坚持下去。其中不无提倡、推动小长篇创作的意向。

关于篇幅长短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意义,目前是有争议的。有人坚持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长或短,而在于质量,在于写得怎么样。要认死理儿,这话自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我总觉得,篇幅与受众的心理,与流行的速度,与阅读的快感,与阅读者的时间承受力,毕竟还是有不无关系的。读者就是读者,读者不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从文学的历史来看,像《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当代英雄》、《贵族之家》、《哈泽穆拉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边城》、《围城》等等的风行一时,除了它们自身的艺术质地,似乎与它们的篇幅较短也有一定的关系。就近年的文坛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大浴女》等的发行成功,似乎也不能说与篇幅较短没有一丁点儿关系。任何道理都不能走极端,都只能是相对的,非要说只有短的才好长的不好,那当然就极近谬误了。

其实,篇幅短小,对作家的艺术功力同样是一种挑战。因为,短篇幅的长篇小说要更加精粹、更加凝练,因而也更为好读。

第一批“九头鸟”振翅飞上了天空,我们静待读者的反馈,我们还要放飞下去,希望它们成为读者枕畔案头的良友。

2000.8.24.

1994年4月17日 G省L南A县城

节气将近“谷雨”，在王余成的记忆中，这个虽在长江流域但却不算江南的地方，也早已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了。不错，麦苗足有半尺高，就是当地俗语说的已经“盖住老鹅”了；杨树、柳树都婆娑着一身葱绿；公路旁坡坝上的野桃花已凋谢，生出指甲盖大的嫩叶，高大的泡桐树缀满绛紫色的繁密的花朵；雪白的狼牙刺，火红的山丹丹也渐次开放。然而，从前天他到这里时天气就起了变化，密布的阴云和连日不断的小雨，给这个即将送走春天的小县城带来了几许料峭寒意，空气凉冰冰的，地上落满了桐花，到处是一片冷清落寞。人们都重新穿上了毛衣和线裤，同时盼望着这种被称作“倒春寒”的坏天气快点结束。

王余成更是心急难耐。

他这次来A县是为了弄清一条重要的党史线索。那是前不久在省上召开的党史工作座谈会上，王余成偶然得知：1984年整党中清理“三种人”，在有关资料里面曾发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省委第一书记侯述之的一些遗物，其中在本人的一份给造反派的交待材料中提到，

1936年9月,他随红二方面军红六军长征到达A县,撤退时受伤,隐藏在一个名叫白马洞的地方,次年1月建立了中共L南特委云屏党支部,地点是白马洞王女子家。作为L南地委党史办副主任,王余成一下子就掂出了这条线索的重大价值,他甚至显出几分震惊和激动。因为L南地区一级的党组织最早是1948年11月由中共G省工委作出决定,翌年2月于徽县正式成立的中共L南地下工委。而L南最早的基层党组织是成立于1938年12月的徽县党小组。这已经是L南党史的定论。现在却冒出了一个成立于1937年1月的云屏党支部,并且前面还冠有“L南特委”。假如这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不仅L南第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时间要向前推两年,L南地区工委(特委)的历史更要提早十二年了。这意味着L南党史将要重写,起码也要作重大修订。

这份材料现在保存在侯述之同志的爱人丁苏同志手边。丁苏也是一位老干部,离休前的最后一茬职务是中顾委委员、省顾委主任,已于不久前举家迁往北京居住。王余成即刻就要专程去北京访问丁苏,亲眼看看那份材料。不料电话一联系,北京那边回答丁苏带着残疾的女儿去南方疗养去了。他又去请教省上一位据说亲眼看过这份材料的党史专家,这位专家说,材料确属侯述之同志的亲笔,是侯述之同志平反昭雪后从原专案组的档案中抽出来的。按当时的有关规定,这类材料应退还本人,所以就交给了丁苏同志。里面关于1937年1月他在白马

洞王女子家建立中共 L 南特委云屏党支部这段话,的确是明白无误的。

回到地委,他立即给 A 县党史办打了电话。很快便得到县上同志的答复,说是他们经过调查,云屏乡并无白马洞这个地名,也没有王女子这个人。至于红军伤病员的事,从没有人听说过,更谈不上地下党组织。这里最早的党员是 1949 年 8 月解放前夕由中共 A 县地下工委发展的。

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搞了这么多年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一条线索是顺顺当当清清楚楚地完成的。岁月的尘封,历史的迷雾,有时好像是动不得的,一动就灰尘扬起云雾弥漫反而什么都弄不清了。并且历史也好像常常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你可以观察它、分析它、猜测它,但却不可以揭开它,触摸它。它有自身的忌讳,有独立的性格和尊严。王余成算不上是专家学者,但对这些也不乏深切的感受。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王余成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沉重艰涩的感觉,好像自己在 L 南这片土地上搞了这么多年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到头来却仍然是一团乱麻。更使他内心不安的是,这条重要线索的发生地点居然是在 A 县!

王余成就是 A 县人。

他与共和国同龄,生下来就不知父母,被一个皮匠收养,住在县城北街的一所破烂房子里。他一岁不到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这位皮匠养父上了前线,将他

托付给邻居家。这家人后来因祸家破人亡，他便被送进政府办的孤儿院，一直到上学、参军。1975年转业到地区档案馆工作，后又调地委党史办公室。这次他本来打算一到县上立即就去云屏乡，亲自查找“白马洞”这个地方和“王女子”这家人，决心要搞出点眉目。不料却遇上了这样的天气，县城通往云屏乡的简易公路因雪水猛涨而中断，恢复通车起码得在三四天以后。今天早上他实在急得不行了，提出要步行去云屏，但被县上的同志劝住了，他们指着东南方那云罩雾锁的重重大山说，云屏的雨肯定比县城还大，河也涨了，绕道爬山走小路也得两三天，还不安全，劝他耐心等着。

吃过早饭，他忽然想到，何不去北街他儿时住过的那个小院里看看？

县城的面貌与当年相比自然是大大地不同了，但北街旧城墙附近那片平民大杂院还依稀可辨。他印象最深的那株老臭椿树居然还站在那里，黑色的粗大躯干一多半生命已经撤离，全树几乎空空如也，只是顶端有三五股枝桠挑着七八片嫩叶，在春天里显得丑陋而凄凉，这形象很像一位老朽透顶而又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衰翁。他的那位他根本没有任何印象的皮匠养父当年住过的房子早已不复存在，但他仍然记得将他托养了两年多的那个邻居的家。尽管后来房子频频易主，也多次修补，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坐西向东，麻条石台阶，青瓦筒兽脊，被风雨剥蚀得满目疮痍的门窗。他上小学时常来这儿玩，因

为院子里有他的同学。当时臭椿树枝繁叶茂,树下有一口辘轳井,夏天树上知了声如潮,人们都喜欢坐在树下井口边乘凉。他一来,老人们难免就要说起那段往事。说这院子其实也就是他的家。听得多了,他脑海里也就牢牢地留下了印象。情形大约是这样:1949年初冬,在宝鸡、天水已经解放了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如决堤的洪水般经由L南向四川退去。A县城一片兵荒马乱,有钱的人都准备逃跑。忽一日有一个神情憔悴的外地皮匠出现在县城街道上,身上背着一捆捆皮带、皮绳、皮包和鞣生皮的用具,怀里还揣着一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婴儿。这皮匠转悠了两天,就在这椿树院租了间房子住下来,他说这婴儿是他在双石铺随逃难的人群往A县走时,一个女人塞进他怀里的。那女人转身就跳了嘉陵江。院子里的人觉得这皮匠是个好心人,就都帮他照顾这孩子。皮匠姓余,叫余升贵,他说这孩子塞进他怀里时,衣服角上写着一个王字,显然是父母的姓氏,所以皮匠就让这孩子姓王名余。这余皮匠似乎压根儿就不打算在此地久住,租房子每次租期都不超过半年。因他有文化,还有制革和养马技术,解放后政府就动员他参加工作,他推辞不干。抗美援朝开始后,按说他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可以不应征,他却积极报名去了朝鲜前线,将孩子托付给隔壁姓成的一家人。于是这孩子的名字后面又加了一个成字,变成了“王余成”。余皮匠一去杳无踪影,成家后来也丁口无留,四岁的王余成便成了人民政府办的孤儿院的

首批入院孩子。

现在，这座房子里住着一户家境贫寒的人，王余成进去时，女主人正领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在制作一种装皮鞋的盒子，家里堆满了硬纸和制作好并贴上标签的皮鞋盒。王余成先自我介绍了一下，那女人便忙不迭地让座、递烟、沏茶。王余成叫她不要麻烦，继续干她的活。闲谈中他得知，这房子早就是公房了，属房管局管辖。女主人一家原来在乡下，丈夫当了三十年小学老师，转遍了大半个县，前年才调进城。他们有三个孩子，她没有工作，丈夫在城关二小当教导主任，一月也就三百来元，还常常拖欠不发，家里生活很紧巴，所以她从私人办的皮鞋厂揽些活来，做一个鞋盒可挣三毛钱。女人诉了一阵生活的艰难，又说起这房子的事情，说是她丈夫的许多学生现在都是书记、局长什么的，都住着洋楼或小独院。她一家调进城后，在二小一间油毛毡房里住了大半年，最后县教委主任亲自找了几回县长，才跟房管局要了这座破瓦房，一月还要掏十几元房费。最近房改，又动员他们花三千元将这房买下，他们哪来这么多钱？再说这房破成了这样儿，能值三千元吗？她问王余成以前是不是就住在这座瓦房里？

王余成点点头，说：“住过，当时这房的房主姓成，成功的成。”

“成功的成？”女人忽然停下手里的活，“是不是叫成明宽？”

“记不得了”，王余成摇摇头，“那时候我才三四岁……”

女人进到里间，翻动了一阵什么，拿出一封拆开的信，递给王余成，说，“是不是这个人？”

王余成接过这封挂号信，收信人的地址写得很有趣“G省A县城北街城墙根不远，大臭椿树院子，西房主人成明宽及后代亲属收”，寄信人地址是：新疆新源县肖尔布拉克农4师3团12连。他取出信瓤，这是用工整的毛笔小楷写的一封信，竖式，夹杂着不少繁体字。

明宽吾兄：

一别四十余载，音信茫茫，死生未知。弟自离开A县，赴朝鲜数年，颠沛流离，飘荡无定，后安身于新疆新源农四师。近十几年来曾数次写信联系，均无回音。当年我离开A县时，将身边一岁半养子王余托付予兄一家，此子若在，想来也已成家立业。不知他情况如何？他生身父母找过他否。弟远在新疆，山隔水阻，天路迢迢，且已近古稀之年，耳背体弱，难以亲自查寻。万望兄委托可靠之人，找到此子，吾当有要事相告。此乃弟余生最大之心愿。不明此子下落，弟虽九死而难一瞑矣。

弟 余升贵(余皮匠)顿首

1994年3月20于新疆新源

信没有看完,王余成的心和手都已颤抖起来。他这样一个生于战乱之中的孤儿,全靠党和政府抚养成人,他的童年回忆,人生情怀以及岁月梦境,全是集体、组织和社会,没有一般人的父母舐犊、兄妹手足的亲情关系。但他对这个余皮匠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思念之情,尽管他只收养了他一年半,这里面仿佛有着某种说不清的宿命的因由。他也动过寻找这位养父的念头,但经验和理智告诉他这只能是空耗时力,白费心劲。尤其在搞了这么多年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后,他明白沉入历史海底的东西是很难打捞的,即便捞上来也面目全非。这位养父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也许以另一种身份面貌活着,尘寰茫茫,往事纷纷,一切的一切谁说得清?他万万没有料到,斯时斯地在这样偶然的情况下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这位养父的确切消息。

“听院子里人讲”,女主人继续干她的活,“好几年前就来过这样的信。这封信是前几天才送来的,孩子他爹拆开看了,说是找人的,他思谋着要给写信的人回一封信,就说这里没这个人,可他忙得很,还没顾上哩!”

王余成拿出自己的名片,说:“孩子他爸回来,请你把这张名片给他。这封信我拿走了,以后要是还有什么消息,请你们跟我联系。”

他已在心里作出决定:待这里的事情一办完,他就立即回地区,然后去新疆。

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县委党史办主任老刘正在焦急地等他，说是刚刚接到地委的电话，叫他火速回地区，县委的小车正在加油，马上就送他走。

“什么事？”他有点吃惊。

“什么事没有说，”老刘说，“电话是地委秘书处打来的，说是奉了杨书记的指示。”

杨书记是地委一把手，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不会去请他下指示的。王余成不再说什么，赶紧收拾东西打道回府。

1994年5月12日 省城

一辆半新不旧的“伏尔加”轿车驶出 G 省农业大学，在著名的安宁桃乡十里大道上奔跑。初夏时节，黄河两岸花红柳绿，桃夭槐茂，一派迷人风光。王余成仰靠在后座上，摸出一支“莫高”烟，却许久没有点上火。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才与这位教授的交谈中。

访问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可是却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这位陈教授是他的 A 县同乡，名叫陈篱，现在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草原学专家，明天就要去北京，然后飞赴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国际草原学年会。他的历史很清楚：1937 年 8 月出生于 G 省 A 县，父亲陈敬容，云屏乡的破落地主，早在 1946 年就变卖了乡下的全部田产，到县城靠出租几间店铺过活，解放后被定为小工商业主，